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四二期 ——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12b)

【几曾回首】朱莉娅·尼克松的访华回忆录	周大伟
【回首文革】“文革”漫谈(下)	王年一
【人物春秋】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	霞 飞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几曾回首】

朱莉娅·尼克松的访华回忆录

• 周大伟 •

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的人民日报头版被两件大事覆盖了：一是首次发表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写的两首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二是毛泽东在中南海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她的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孙子）。朱莉娅·尼克松夫妇幸运地成为毛泽东在生命最后一年里接见的第一批外国客人。中国官方为此拍摄了彩色纪录片。美国的主要电视广播网也很快报道了这一消息。会见的第二天，新华社向驻京外国人发布了英文电讯稿。法新社记者乔治·柏安尼当即评论称，作为非官方人士，朱莉娅·尼克松夫妇在中国获得了惊人的和前所未有的款待。

朱莉娅·尼克松后来对这次中国之行有何感想？作为一个以作家、编辑和家庭主妇为职业的名门之女，她是否撰写了关于中国之旅的回忆录？这是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不少人可能关心的问题。

二〇〇五年夏天，我在美国北加州的一个名叫 Burlingame 的普通社区公共图书馆里，意外发现了一本一九七七年由纽约 Simon and Schuster 出版公司出

版的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个人回忆录：Special People（书名可译为“非凡的人们”）。图书归类为“二十世纪：回忆录（Biography—20th century）”。全书内容包括了朱莉娅对自己会见过的各国政要和名人的回忆和评论。在这部书中的前言中，朱莉娅·尼克松提到，在一九七六年夏天，也就是她访问中国的六个月之后，她就动笔写作这部书了。此时，她的家族里还有两个人也在写书：就在离她的书房仅隔着两个房间的地方，她的父亲也在忙着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在跨越北美大陆的宾西法尼亚州，她的丈夫的父亲艾森豪威尔先生也正沉浸在他的第三本书的写作之中。

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在这本书中将这次中国之行专列一章，题目就叫“毛泽东”，还在标题下面特意附上了毛泽东的一句著名诗词：“Ten thousand year is too long. Seize day! Seize the hour!”（“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全章包括照片在内洋洋洒洒近四十页。

令人颇感困惑的是，这部有研究价值的回忆录至今没有在国内得到介绍，大陆官方机构几乎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本回忆录的存在。原因何在？其实，只要人们粗略地读一下这一章节，便不难发现问题的答案。

尽管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在中国访问期间享受到了中国官方极为热情和超规格款待，然而，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发表的访华感想，特别是对毛泽东本人的评论，足以使中国官方体验失望和尴尬。由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部回忆录显然不适宜在国内介绍。

我在Burlingame的社区公共图书馆角落里找到的这本书，书页已经发黄。近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这部书几乎被世人遗忘。但是，从这本书中，我们还是可以寻觅到那个年代的记忆中留下的或深或浅的痕迹。

二〇〇二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为纪念尼克松访华三十周年，拍摄了“改变世界历史的七天”特别节目。赴美摄制人员找来了尼克松的另一个女儿特里西·考克斯。主持人张灵泉在采访特里西·考克斯时屡次问道：“您后来见过毛泽东，是吗？”“你最近一次去中国是什么时候？”特里西·考克斯委婉地解释说，她是他们家里唯一没有去过中国的人。只是她的儿子最近准备去中国参加“上海公报”发表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显然，节目的编导或主持人没有完全弄清楚尼克松的两个女儿的真实身份。最有趣的是，特里西·考克斯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只字未提她的那个真正去过中国的妹妹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后来人们才知道，当时这两个姐妹正在为尼克松图书馆的一笔巨额赠款的使用方式各持己见甚至对簿公堂。有消息证实，当时这对亲姐妹已断绝往来五年之久。

显然，朱莉娅·尼克松在访问中国之前曾阅读了美国传播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报道以及毛泽东个人革命生涯的介绍。在他们这一代美国青年人的眼里，毛泽东显然是个“天才和魔鬼”结为一体的伟人。她在书中写道，她和自己的丈夫在北京见到的毛泽东，尽管已经是病体缠身、风烛残年的老人，但在他们的心目里，它既是个统帅八亿之众的大国领袖，也曾经是一个鼓动他的同志们“在富人家女儿的床上打滚”（“Trample the beds of rich men's daughters”）的青年革命家。看来，毛泽东当年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只言片语，在翻山越岭传到国外后，已经被人们做了断章取义的理解。显然，作为世界级的豪门之女，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对毛泽东深怀戒备。

◇ 意外的惊喜：毛泽东深夜召见

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是以普通美国公民的身份，并以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

镇的私人朋友的身份来中国访问的。然而，当他们乘坐的飞机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早晨降落在北京机场时，他们才突然真正意识到，在他们的这次访问背后可能暗含着某种巨大的政治利益。在机场前来迎接他们的人中，他们看到了专程回国的黄镇主任夫妇，还有毛泽东的私人翻译唐闻生。当他们被直接送到宽敞豪华的政府宾馆时，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旅行。

不过，她和她的丈夫始终还不敢奢望中国政府会提供一个让他们会见毛泽东的机会。

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十一点多钟，已经准备就寝的朱莉娅·尼克松。

艾森豪威尔夫妇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已经穿了睡袍的朱莉娅急忙躲到门后，让丈夫戴维去开门。一个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官员出现在门口，他激动地宣布说：“朱莉娅·尼克松，毛主席要见你们！”

艾森豪威尔夫妇马上用最快的速度换好衣服。匆忙中，朱莉娅还特意穿上母亲专门借给她的一件黑色的绣花长袖衬衣，并带上父亲尼克松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匆匆登上汽车前往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

深冬的北京夜晚，夜雾迷蒙，寒风凛冽。北京的街道上除了几辆军用吉普车和卡车外，还可以看见几辆农民驾驶的马车在夜色中缓慢地行驶，马蹄声在寂静的街道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朱莉娅夫妇乘坐的汽车进入中南海新华门后，沿着一个湖边继续行驶数分钟后来到了毛泽东的住所门口。他们记得经过一个灯光灰暗的乒乓球室后，走进毛泽东那间著名的书房。在门口，他们终于看到“这个被亿万中国人视为上帝的领袖人物”了。毛泽东正坐在书房里等候他们的到来，他的身躯深陷在一个宽大的沙发里，其它五个同样的沙发呈半圆形摆在毛泽东两侧，每个沙发之间小桌子旁边都放着一个白色的痰盂。在他身边两个年轻女子的协助下，毛泽东吃力地起身和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握手并让新闻记者摄影和摄像。

曾经在电影里扮演毛泽东的著名已故特型演员古月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一段趣闻。他听说，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的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在见到毛泽东时说，主席先生，我发现您的面部的上半部分非常好看。毛泽东听后高兴地大笑了起来，并风趣地说：“我长了一张大中华的脸”。

美国人也真有意思，看人家的脸还一半一半地看。其实，戴维·艾森豪威尔讲的可能是老实话。毛泽东面孔的上半部，主要是宽阔的额头和充满智慧的眼睛，的确富有世纪伟人的魅力。但是，此时此刻，他面孔的下半部，已经毫无光彩。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在书中写道，她当时见到的毛泽东，给她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极其衰弱的老人，神态里能看出中风后的迹象，目光空泛、两条长臂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下巴垂落，声音颤抖、口中不时流着口水。朱莉娅·尼克松此时突然感到，尽管当初他们是那么渴望见到这个神秘的巨人，可是此时毛泽东就在他们面前了，她却深深地感到有些歉意。她突然觉得，在这个时候来会见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似乎是对他的一种冒犯。

朱莉娅把父亲的亲笔信交给毛泽东。翻译唐闻生立刻将它翻译给毛泽东听。他非常认真地听着尼克松的信文，并高兴地说：“欢迎尼克松先生来中国”。最后，他还从唐闻生手中拿过那封信，令人惊讶地用准确的英文发音读出了信文上方标明的日期：“十二月二十三日，一九七五”。他想借此告诉周围的人们，他肢体上的衰弱还没有影响到他的脑力的敏捷。

毛泽东对朱莉娅说，你现在就坐在你父亲四年前坐过的同一张沙发上。朱莉娅马上调皮地

告诉毛泽东她想和自己的丈夫临时调换一下座位，以便让戴维也有机会感受一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位置。毛泽东一边看着一边开心地笑了。朱莉娅还把黄镇夫人送给她的毛泽东像章指给他看，毛泽东激动地拍了拍朱莉娅的手。朱莉娅发现，尽管毛泽东看到过亿万男女大众佩戴他的金属像章，此时他的脸上还是露出了童真般的笑容。谈到他即将发表的两首关于斗争内容的诗词，毛泽东则轻描淡写地说：“没有什么，那都是我在一九六五年写的东西。”与自己过去见过的其他世界级铁腕人物（比如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相比较，此时的毛泽东显得额外慈祥。朱莉娅·尼克松注意到，毛泽东和唐闻生看来简直就象是祖父和孙女一样的关系。黄镇等人在会见时，则漫不经心地环视书房四周，似乎并没有在认真听自己的领袖讲话。朱莉娅认为，毛泽东此时的宽容，并非故作姿态，这显然与他的年龄以及目前过度依赖他人的病体有关。

朱莉娅在会谈期间，特别注意到毛泽东身边的两个年轻的女人，“她们小心翼翼地坐在毛泽东的身后，看上去像是和毛泽东一同呼吸一样，她们对毛的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无微不至的体贴”。当朱莉娅夫妇准备告辞时，其中一位女士在搀扶毛泽东起身的同时，还急忙用梳子给毛泽东梳理一下有些散乱的头发，这样可以使毛泽东再次体面地面对摄影师的镜头。朱莉娅注意到，这个女人尽管身着单调的毛式服装，但她拥有一付极为安详和美丽的面容。朱莉娅以为，“像毛泽东这样一个曾经身体健壮的男人，在目前衰老到不得不依赖他人服侍的境况下，这些年轻美貌的女人会在一定意义上舒缓他的精神紧张，并成为他对付与世隔绝的耳目”。

谈到自己国家的人民，尤其年轻一代，毛泽东的声音听上去显得迟疑和失望。他对朱莉娅夫妇说：“年轻人是软弱的。我们不得不提醒他们：需要去斗争”。说到此，毛泽东突然像年轻人一样显得激动起来。

他把自己的手指攥成拳头，接着说：“党内有斗争，阶级之间有斗争。除了斗争之外，没有什么必然的”。朱莉娅夫妇看出，斗争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语，而是毛泽东哲学的根本原则。然后，毛泽东突然对着朱莉娅夫妇问道：“你们认为怎样？”朱莉娅夫妇对这个问题毫无准备，两人几乎同时支支吾吾又言不由衷地回答着：“我同意……”毛泽东显然还期待他们能多说几句，但朱莉娅夫妇则沉默不语。他只好最后自己接着说到：“至少还要斗两百到三百年，这是非常可能的。”和不少同时代的美国年轻人一样，朱莉娅夫妇属于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新一代。他们显然属于喜欢“做爱而不作战（Make love, not war）”的一代人，对于毛泽东鼓吹的斗争哲学，在他们听起来多少有点像今天的年轻人听本·拉登谈原教旨恐怖主义的感觉差不多。不过，在那个冷战的岁月里，从巴黎的香榭丽大道到智利的贫苦乡村，毛泽东的思想也的确成了众多左翼青年人追求激进变革或描绘完美社会的战略原则与理念。

其实，在朱莉娅夫妇对毛泽东讲的“斗争”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不知是因为什么，到达北京的第一天，中国人就安排他们去清华大学看揭发批判教育部领导人的大字报。朱莉娅在回忆录中用揶揄的口吻说：“这是他们和毛泽东会见前最具有戏剧性的前期准备”。

不过，朱莉娅似乎也被这个老人执著的斗争哲学感染了。她总算也多少理解了一点：为什么这个国家的亿万男女老少竟然可以在小红书（毛泽东语录）的引导下变得如此倔强和狂热。但她还有点不明白，毛泽东此刻还在担忧什么呢？朱莉娅意识到，毛泽东显然是在担心未来。他在担心后人将如何评定他永久的革命功绩（朱莉娅记得毛泽东当时给自己的革命彻底成功率打了不足50%的分）；他在担心，曾经跟随他长征的同志们陆续离开这个世界后，那些从未经历战争困苦的年轻一代人能否继续“斗争”下去，直至斗出一个无阶级差别的完美社会。

大约在十二点半左右，在座的外交部长乔冠华不断用手指点着自己的手表，暗示人们：时间太晚了，会见结束的时间到了。不过，毛泽东的谈兴甚浓。朱莉娅两次起身告辞，都被毛泽东用双手示意：不要急，再坐一会儿。在最后朱莉娅夫妇向毛泽东道晚安后，毛泽东用明确和

有力的语调说道：“我将等候你父亲的到来”。

在离开毛泽东书房的最后时刻，朱莉娅回头看到一个令人伤感的剪影：毛泽东在两个女护士的搀扶下，站在门口，挥了两下手，然后默默地注视着客人们远去。

◇ 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冲突

读过朱莉娅访华回忆录的中国人，大概会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结论：朱莉娅辜负了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给与他们的盛情款待。其实，这个结论是轻率的。人们很容易忽略其中由于两国文化以及政治背景导致的冲突和尴尬。

朱莉娅在回忆录中提到，那天深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毛泽东曾主动开始回答那些可能在西方社会流传的悬念。毛泽东大概也知道眼前这对美国年轻人所接受的教育背景，他对朱莉娅说：其实，我们并不像你们想得那样可怕。我们并不杀人。我们也能宽恕犯过错误的人们。

我们最近就原谅了一些国民党分子。毛泽东指的是一九七五年夏天前后刚刚被特赦释放的一批在国共内战期间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不过，毛泽东的话并没有打消朱莉娅脑子里的疑问。相反，她倒觉得毛的话充满了滑稽和讽刺意味。她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大约有两千六百万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红色中国遭到镇压”。

在访问中国的日子里，朱莉娅几乎完全不能理解中国人对家庭生活和亲情关系的忽略。在欢送他们去上海访问的宴会上，黄镇主任对朱莉娅夫妇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的旅行，他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家庭成员一样”。然而，朱莉娅却对这句足以使任何一个中国人热泪盈眶的话语充满疑虑。她觉得，这句话并不真实。在美国人看来，“家庭成员”这个字眼是不可以随意使用的，其中一定要包含足够的亲情。她在回忆录中质疑说，既然你把我视为你的家庭成员，那你总应该把你家里的其他家庭成员介绍给我吧！可是在访问中国期间，包括和毛泽东本人见面时，没有任何人提及毛泽东的家庭中妻子儿女。当她在私下询问王海容女士：“听说你和毛泽东是亲戚，是吗”？王海容一脸的不高兴，她表情冷淡，未置可否地回答说：“有人是这么说的！”

在酒会上，黄镇大使回忆起六个月前他在加州拜会辞职后的尼克松时的情景。他提到尼克松当时讲过的一句话：“当我离开（白宫）办公室后，我才发现谁是我真正的朋友”。黄镇然后动情地对朱莉娅说，“我们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朱莉娅注意到，中方译员在翻译这句话时眼睛里似乎含着泪水。经历了片刻感动后，朱莉娅又“清醒”了。

她在书中写道：“对于我父亲这个老朋友，估计中国人大概不会忘记了。可是对于他们自己的老朋友呢？比如一九五一年的高岗；一九六六年的刘少奇和一九七一年的林彪。这些毛泽东的老朋友，今天都在哪里呢”？

朱莉娅在回忆录中写到，在中国旅行的日子里，她和她的丈夫这两个美国人像是被空降到了另一个星球上一样：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沉闷而毫无幽默感的国度。每天晚上九点半左右，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关门睡觉了。和芝加哥的规模相当大小的北京城，在黑黑的夜幕中，静谧得像一个中世纪的农场。尽管当时的毛泽东还主张不停地“斗争”（一个月前他还说，“八亿人，不斗行吗”？），不过，在朱莉娅夫妇一路访问过的中国城市里，他们当时没有发现毛泽东所执意要坚持的“继续革命”还可能再次引发一九六六年时的紧张气氛。朱莉娅的感觉是准确和细腻的。的确，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即便是当初最激进的人们，也似乎感到疲惫了。再这样“斗”下去，大家都要去喝西北风了。

在朱莉娅夫妇心目里，中国人的生命过程是粗糙的。他们不仅不怕苦，而且不怕死。天晓得她从哪里听到一个传闻：“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一直为这个国家的存亡而斗争着。这个国家有足够的人，但没有足够的枪。以至于在一九五一年朝鲜战场上，只有第一排的人才发枪，跟在后面一排的人捡起前一排倒下的同志的枪，像波浪起伏般前进”。这个传说显然是极其离奇和荒诞的。

在这个神秘而封闭的国度里，朱莉娅和她的丈夫显然是在用一套纯西方式的文化优越感来审视他们在中国看到的一切。

朱莉娅问黄镇大使，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他喜欢哪一家中国餐馆的菜？从黄镇大使的回答中，她吃惊地发现，这些中国外交官们几乎从来没有去大使馆以外的中国餐馆吃过饭。朱莉娅无法想象，黄镇大使这些外交官当时在西方世界中行动的极不自由。当然，其中还有中国外交官们由于外汇短缺带来的拘谨和尴尬。不过，朱莉娅却注意到，在中国政府每天的宴席上却常常摆满了太多的美味食品。作为一个从美国来的贵族小姐，她和她的丈夫都感到有点太挥霍浪费了。

由此，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由于中美之间政治和文化的鸿沟，朱莉娅的批评和讥讽已经苛刻到了不近人情地步。不过，如果我们愿意冷静下来思索一番，大概也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一些自身文化的缺憾和那个经济贫困年月的窘状。

在中美关系问题方面，朱莉娅始终带有美国人固有的优越感。她认为，尼克松是在中国面临苏联巨大军事威胁的形势下来中国访问的。他的这一选择有可能会激怒俄国人并直接面临一九七二年五月美苏首脑会谈被取消的风险。为此毛泽东自然会对尼克松充满感激之情。其实，直到今天，包括朱莉娅在内的不少美国人依旧固执地认为，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签署，是美国人帮了中国人的大忙，它使中国人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被俄国人吞并的危险。中国人应当寻求美国的保护。有证据表明，美国官方上层也有此类见解。朱莉娅显然不愿意多谈美国当初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惨状，也不愿意谈到美国与前苏联争夺远东利益的迫切需要。在冷战时期，中美两国到底谁需要谁更多一些？到底谁帮谁的忙更多一些？今天看来，这显然是个不值得进一步展开讨论的问题。

朱莉娅在回忆录中甚至认为中国人如此重视他们的这次访问，显然不完全是因为毛泽东和她父亲之间的私人情谊。中国人期望利用他们的这次访问向华盛顿发出信息：中美关系能够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朱莉娅写道：“在中国，我们只是持非外交护照的私人旅客。

然而，中国政府却让我们带回家一个紧迫的信息：要警惕苏联帝国主义的贪婪扩张之手。中国人或许过高估计了我和我的丈夫传递这个信息的能力“。

◇ 题外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其实，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朱莉娅也同样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在这本回忆录中，朱莉娅显然巧妙地回避了毛泽东关于她父亲尼克松由于水门事件下台这个尴尬的话题。

据其他相关资料记载，毛泽东一边看尼克松的信一边问道：“总统先生的腿怎样了？”“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话转告总统先生。”尼克松已经在一九七四年辞职下台，但毛泽东还执拗地称呼尼克松为“总统”。

“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戴维·艾森豪威尔插进话说。这位尼克松的女婿的插话坦诚得令

人吃惊，不过倒是很符合美国年轻人的个性。

“我乐意这么叫他，你管得着？”毛泽东不容分辩地说：“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有点儿书生气的戴维不能同意这话，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的政治……”毛泽东有点不耐烦了，又抢过话来：“西方政治？那是假的。简直假死了，也脆弱死了。两卷录音带就能把一个帝国搅得天翻地覆，不是纸糊的是什么？”

尼克松由于水门丑闻下台，毛泽东完全不能理解。他无论如何想不通，怎么几盘录音带就能把一个世界大国的总统赶下台了呢？说实话，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很难想象到，尼克松的下台和美国宪法之间有什么关系。

其实，对美国宪政民主的实际运作不能理解的并不只是毛泽东。当初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就说：“为几卷录音带大吵大闹，值得吗？”

埃及总统萨达特说得更坦诚：“大惊小怪，统治者难道不允许进行统治？”

尼克松的女婿和毛泽东争辩的所谓“西方政治”，大概是指西方国家权力相互制衡的机制。在这种制衡机制的作用下，任何权力都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都要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即使总统也不能例外。比如，在这种宪法的契约条件下，人民委派一些人担任行政首长来代为管理和处理公共事务。如果一个总统滥用权力，就是违反了契约的规定。由此导致的信任危机显然非同小可。

当毛泽东在他的中南海的书房里对尼克松的遭遇深表同情时，或许，尼克松正坐在位于南加州的豪华别墅书房里写他自己的回忆录（北京时间深夜十二点是美国加州时间上午九点）。他大概也会想起那个年代发生在遥远中国的很多事情。让他困惑不解的怪事恐怕也少不了。

比如说，为什么未经过任何合法程序，毛泽东就非要将刘少奇、彭德怀这样当年在一起出生入死艰难与共的人置于死地呢？比如说，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林彪元帅为什么一夜之间会成为折戟沉沙的叛逆呢？

还有此后不久出现的一个新疑问：为什么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初的日子里，毛泽东可以在三更半夜里出来接见自己的女儿和女婿，而不能去参加为他的国家积劳成疾鞠躬尽瘁的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呢？

可以理解，以毛泽东等习惯的思维方式，几乎完全无法想象当时发生在美国总统和司法程序之间那惊险的一幕幕场景：一九七三年春夏之交，当依照司法程序要求一个美国总统服从正常司法程序交出手中的证据时，这个总统是否有某种特权拒绝服从这一强制性的司法程序呢？霎那间，代表美国司法的一方和象征美国政府权力的一方，就在这宪法的岔路口上，开始僵持不下。很多美国人这时候总算是明白了，总统滥用权力这码事，并不全是一个遥远的别人家里的故事。

一九七三年年底，新任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带着一盘已经获得的录音带前往白宫。就是在这盘录音带中，尼克松提到如何教唆手下人做伪证的方法。独立检察官郑重地请白宫幕僚长黑格将军向总统传达一个最后的忠告：“根据我的判断，总统已经卷入了刑事犯罪案件。他最好是聘请一位他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由象征着美国人民的那些普通陪审员组成的大陪审团表决结果认定，理查德·尼克松这位被美国人民安排在白宫漂亮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上班的总统，是一个

欺骗美国人民并涉嫌妨碍司法的阴谋的成员。

听过第一批录音带后，国会司法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要求尼克松交出另外一百四十七次的谈话录音。尼克松对此断然拒绝。但是，最高法院以八比〇（一人弃权）一致通过，要求尼克松继续交出录音带。

最高法院裁决的八小时后，尼克松的律师克莱尔宣读了尼克松的声明：“我尊重和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这位权高位重的政治领袖，终于在宪法面前低下了他骄傲的头。一九七四年八月，面对国会的弹劾案，尼克松决定辞职，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自动辞职的总统。

他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宣布辞职。在场除了他的妻子，还有他心爱的女儿以及女婿。

尼克松辞职后，自然就不是总统了。水门事件的巨大政治风波嘎然而止，没有引发政治搏杀，也没有引发社会动荡。不过，也没有什么人打算“痛打落水狗”，或者非要把尼克松“打翻在地”并“再踏上一只脚”。尼克松回到自己在南加州的家乡，开始撰写他的回忆录，并开始了退休总统的优裕并繁忙的生活。看上去，他从待遇到生活状态，和其他离任总统别无二致。

新任总统福特在上任后不久，宣布了对尼克松的特赦令。

这里，让我们提及一个小小的插曲。

在尼克松决定辞职的前一天深夜，尼克松在白宫的林肯起居室准备辞职讲话一直到凌晨两点。当他准备就寝时，在枕头上发现了小女儿朱莉娅的一张便条：“亲爱的爸爸：我爱你。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我为你而自豪。请等上一周或者十天再决定吧。在煎熬中再忍耐一段时间吧！你是那么坚强！我爱你！万万次支持你。朱莉娅”。

尼克松事后写道：“如果当时有什么能改变我的主意的话，那么就是朱莉娅的这封信了。但是我已精疲力竭，无法重新考虑。这不是因为放弃了这场斗争，而是因为我已知，对国家来说我所做的决定是最佳的”。

看得出，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女儿，朱莉娅对自己父亲的引咎辞职是极为痛心的。

◇ 朱莉娅二十七年后重返北京

朱莉娅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在毛泽东的书房门口，年迈的毛泽东拉着她的手说：“你们还年轻。再到中国来吧！再过十年，中国会棒极了”。

二十七年后的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为了纪念尼克松访华三十周年，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4）《让世界了解你》节目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的一场题为“穿越历史的对话”特别节目。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作为该节目的特邀嘉宾再次来到北京。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朱莉娅在节目录制现场见到多位与他父亲三十年前访华有关的人，比如尼克松访华时的中方翻译冀朝铸和章含之等，并与他们回顾那段中美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她触景生情。

她深情地回忆到：“我父亲常常向我们提起那次难忘的中国之行，父亲的那次破冰之旅重新开启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从此改变了世界，他一生中以此引以为自豪，我们全家人也为父亲的

英明之举引以为自豪。”

中国官方报道说，朱莉娅在这次活动中听了许多关于中美关系的故事，“让她更深地感觉到了她父亲一九七二年中国之行的伟大之处。她反复地说要继承父亲的遗志，为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关系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不过，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朱莉娅本人，始终都没有人提及朱莉娅那本一九七七年出版的回忆录。

主要参考文献和注释：

1、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个人回忆录：S p e c i a l P e o p l e。一九七七年由纽约S i m o n a n d S c h u s t e r出版公司出版

2、尼克松的回忆录“ I n t h e a r e n a : A m e m o i r o f v i c t o r y , d e f e a t , a n d r e n e w a l “(在竞技场上：胜利、失败和重新崛起的回忆)。

3、改变世界的七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4、尼克松两女儿为巨额赠款控制权对簿公堂。来源：中国新闻网，

5、2002年03月17日5、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6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6、“我生着一副大中华的脸”——观大型文献纪录片《走近毛泽东》

~~~~~

## 【回首文革】

### “文革”漫谈（下）

• 王年一 •

#### 十一、毛泽东的个人专断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述及“文革”前十年的毛泽东时说：“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文革”这一部分又说：“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从组织上说，伟大的毛泽东晚年犯错误，就犯在个人专断上。

毛不知道个人专断不好吗？不是。他在《关于健全党委制》（1948年9月20日）中说过：“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说过：个人专断要“霸王别姬”。毛泽东1975年5月3日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说到自己：“这一回跑了10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个人专断呢？

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实质，是维护他自己的、不为集体所同意的主张。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毛并不专断，而是模范地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的决定，毛泽东从未滥用这个权力。即使在50年代末期以后，他在一些问题上也不专断。专断常常表现在1958年以后他和中央集体在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也只有这时才需要专断。他当然知道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重要，但是他认为他出于公心坚持他自以为正确的意见更重要，错就错在这里。在坚持组织原则和坚持他的意见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他放弃了组织原则，认为组织原则要服从政治原则。一个典型例子：毛泽东未经中央集体同意，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讲话，发动批判彭德怀。他知道中央常委不会同意，所以先斩后奏。他认为“右倾思想”泛滥，必须抓个典型，杀鸡儆猴。这个典型，就是彭德怀。

毛泽东长期的正确使他过于自信。（他在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信中引用了刘邦的话：“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又貌为谦逊实为自负地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长期的领袖地位和长期受拥戴的状况使他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指导党。1947年至1957年的10年大胜利时说过“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毛泽东不由自主地不自觉地骄傲起来。他又有可能机械地搬用了他在历史上独排众议而取得伟大成功的经验。

毛泽东并不认为个人专断好得很，个人专断在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他想方设法让中央集体在事后同意他的意见，使他的意见成为中央集体的意见。可见他不是从根本上不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是很特别的，就是在程序上或手续上一般经过集体。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如对毛泽东的依赖，在毛泽东造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不得不顾全大局，对某个问题没有成熟的见解，党内生活不正常），中央集体常常无条件地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或在事后同意毛的意见，使得毛的个人专断不那么突出。号召成立人民公社，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批判彭德怀，在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把阶级斗争作为会议的主题等等，本来都是出自个人专断，却都成了中央集体的意见。这不仅使少数人更难于反对不正确的意见，而且使毛泽东更有理由坚持自己的意见。邓小平说过：“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邓小平文选》第273页）这种看起来是集体决定，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为个人决定的奇特现象，是独特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毛泽东以前长期代表正确因而具有极高威望，没有任何人与匹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在众人的眼中，他是“革命之父”。领导制度不健全，也是一个重要条件。

总之，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情形相当复杂，把它简单地归咎于封建主义的影响，是想当然的看法，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这里需要说到上一篇提出的问题了。何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之后毛泽东又个人专断了呢？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估计中央集体不会同意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主张。像在全国开展大串连、全国全面夺权这类问题，中央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实不同意。毛泽东还是想办法要中央集体同意的，中共“九大”就全都同意了。

全党造就了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也就是全党造就了一个不受约束的领袖。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全党也有责任。毛泽东从未讳言“文革”是他个人发动和领导的，又有几个人提过异议呢？

## 十二、一个大人物的沉浮

这个大人物就是乌兰夫。他又名云泽，蒙古族，是位老革命，1923年12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后任过许多领导职务。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1966年他任如下要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内蒙古大学校长。

人们都知道在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错误地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可能不少人还不知道同月错误地批判了乌兰夫。对乌兰夫的批判，是在5月华北局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进行的。从6月7日到7月20日，又揭发、批判了43天。7月23日，华北局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给乌兰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

不能说乌兰夫在工作中没有一丁点儿错误，但是总的说来批判以是为非。谓予不信，请看《报告》最重要的第一部分的摘抄：“乌兰夫放肆地篡改和歪曲毛泽东思想。1963年8月8日，毛主席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里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乌兰夫……一再说：‘民族问题就是人民问题’，‘毛泽东思想是民族团结’，‘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概念：巩固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只要在民族问题上抓住这两条，我看就根本抓住了民族问题的核心’。”“主席说：‘蒙、汉两族要密切合作，要相信马克思主义。……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那个有没有共产主义？……’……而乌兰夫不仅没有在党内传达这一指示，反而和主席公开唱对台戏。他强调‘逐步实现党的领导机关民族化，是一个带根本性的任务。’”“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阶级斗争。而乌兰夫却……反复强调‘民族问题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民族问题，突出民族问题就是最大的突出政治。’”“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乌兰夫却……说：‘学毛选要从自治区的实际出发，要有的放矢。……不从实际出发，不解决针对性问题还不是教条。’‘学习毛泽东思想要与内蒙古实际相结合’。”不必赘引了。谁是谁非是很清楚的。

彼时是非混淆。乌兰夫的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内蒙古大学校长等职务先后被撤掉了。一时还保留了一些职务，但在实际上，乌兰夫在5月以后就“靠边站”了。

在内蒙古，很快出现了打倒乌兰夫的一派（少数派）和拥护乌兰夫的一派（多数派）。1967年1月，在呼和浩特市出现了“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地下司令部”为乌兰夫翻案的传单。内蒙古军区的广大指战员，站在多数派一边。

1967年1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致电中共中央并华北局，请求批发《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显然，想以中央的威望来压制多数派。1月23日，华北局给毛泽东、中共中央打报告，表示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请求。报告建议：“把乌兰夫的错误问题，在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和军队党的基层组织中，在革命群众的组织中，进行公布，以利于内蒙古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1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

压而不服。首先内蒙古军区不服，公然抗命。全国第一个开枪打死学生，发生在内蒙古军区。（在1967年2月4日，内蒙古军区一军官开枪打死冲击军区的、持打倒乌兰夫观点的学生韩桐。）

打倒乌兰夫的一派和反对打倒乌兰夫的一派，在1967年、1968年进行了剧烈的争斗。

“文革”中，全国涉及人数最多的冤案是“内蒙古人民党”冤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说：“内蒙古自治区‘内人党’等冤案，有346000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确有坏人兴风作浪，但是说到底，这是由打倒乌兰夫引起的。1967年，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一负责人在革筹小组会上说：“乌兰夫披着民族外衣，在内蒙古干了20多年的反革命勾当，他的这条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路线真是又粗、又黑、又深、又长。”挖“黑线”、肃“流毒”的结果，是制造了“内人党”冤案。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宣布解放乌兰夫。8月，乌兰夫被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乌兰夫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88年12月8日病逝于北京。

### 十三、关于彭德怀的一些资料（上）

这回介绍一些确凿的史料。如果加以分析，决不会毫无益处。

1959年7月4日，刘少奇在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去年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小视。1958年经验丰富，教训深刻。1958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不要责备下面。7月6日，朱德在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南组会上发言，说：农民还有私有性的一面。供给制，共产风。全党在生产上、消费上吃了大亏。供给制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按指公共食堂）全垮了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农民要富，要使之富起来，不会成为富农路线。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其他乱得不太大。各省不要搞工业体系，工业方向要。7月14日，彭德怀致毛泽东信，就若干重大问题提出批评。7月21日，张闻天在东北组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并作了系统的说明。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发动批彭。

1959年8月18日至9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1061名师以上干部出席会议，另有508人列席。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外事会议上有人提出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嫌疑”问题。9月1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他说：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党内。

据丁隆炎《彭梅魁和她的伯父彭德怀》（载《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5期），彭德怀1961年说过“我想过了，只我甘愿毁灭还不行，我生不求功，死不图留名，但还是留下一个不公正的风气！想打倒一个人，就给他安个莫须有的罪名，这个罪名站不住，就再安一个。这可不是毁灭我一个人的问题，是毁灭了一个党。”

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

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

彭德怀没有能够参加七千人大会。彭大将军在得悉上引讲话后，大哭一场。1962年6月16日，彭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递送一封长信（即“八万言书”），详述了自己的历史，请求中共中央全面审查，并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8月23日，他又写一短信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再次恳求中央组织专案审查，以澄清问题。（“八万言书”，当时连中央常委陈云都没有见到过，八届十中全会上摘录印发。）

1962年8月5日，毛泽东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谈话时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他还表示，绝对不能给彭分配工作。八届十全会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贺龙），对彭德怀进行审查。这个委员会，比较实事求是，没有给彭强加以罪名。

1965年秋，彭真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彭德怀，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彭到西南领导大三线建设。彭回家后对警卫参谋景希珍说：“我没有答应，我不懂工业，也不想搞和军队有关的事，因为我早和军队脱离关系了。”他致毛泽东一信，要求调他到国营农场去，说他还是愿当农民。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彭在谈话后作了追记。这个追记是《彭德怀自述》一书的附录二。毛说：“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到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彭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谈到庐山会议时，毛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次谈话，《在彭总身边》一书第112至114页上作了记叙。）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彭德怀我这次找他谈话，他想搞军工。我跟他说了，一扯扯了5个半小时。“王明、李立三、彭德怀这些人选不选？我是倾向于选。”“斯大林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杀掉，我们的办法，中央委员会是左、中、右，有右的好。”言下之意，彭德怀右。（大区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毛的讲话，有的大区在当时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分组会上作了传达。）

#### 十四、关于彭德怀的一些资料（下）

毛泽东1965年9月23日与彭谈话，先后在场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毛要彭到西南大三线任副总指挥，彭不好拂意违令，同意了，却迟迟接不到调令，得不到出发的通知。

1965年11月30日，彭到达成都。车站上没有一个当地负责人来接待。这一天，正巧《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连几天，没有一个当地的有关负责人来看望他。彭接到出席一个晚会的通知，他出席了，当地的许多负责人与坐在彭前面座位上的一些人热情握手、寒暄欢笑，没有一人走到彭的前面。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谈话，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1966年6月16日，关锋、戚本禹联名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信，诬陷说：“彭德怀

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他们提出：“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关锋1980年1月24日交代：“1966年6月间，在上海开会。江青对我和戚本禹说，分配彭德怀到三线任副总指挥，不是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并不同意。但在中央占少数，只好同意他去。毛主席说：一个共产党员，可以保留意见，可以向中央提出意见。我听了就信以为真了。我和戚本禹共同给毛主席写了信，表示不同意彭德怀任三线副总指挥。”）

1966年12月，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指使，布置北京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派人去四川挟持彭德怀。《快报》（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编印，绝密，印数极少，只供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极少数人参阅）第748号（1966年12月21日）报道了韩爱晶布置抓彭德怀的任务的情况。12月26日，戚本禹写信向江青报告：“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作了斗争的准备。”12月8日，彭被揪回北京，由红卫兵带到地质学院。周恩来闻讯后派傅崇碧去接到北京卫戍区加以监护。

1967年1月1日，彭给毛泽东写一短信，报告已被押解到京，失去自由。

1967年7月，毛泽东指示：公开发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的决议。

《快报》第3199号（1967年7月20日）报道：北航、地院60多人7月19日下午在北航斗争、审讯了彭德怀，为召开斗争大会作准备。会开了一个多小时，韩爱晶等气愤之下打了他一顿。（按：彭被打倒在地7次，前额被打出血，肺部受了伤，两根肋骨被打断。这些情况，北京卫戍区上报了。）《快报》第3396号（1967年7月26日）报道：7月26日下午4时，北航、地院学生斗争彭德怀、张闻天。（按：彭身负重伤，被揪到“批斗彭德怀的万人大会”上。会上又搞“喷气式”。会后，又把彭押上卡车进行游斗，由两个人揪着他的耳朵，一个人托着头，扳着腰，拳打脚踢，从北航经新街口、西单一直游斗到天安门。彭的手和胳膊全被拧坏，浑身伤痕累累，已经不能行走，是被人从汽车上抬下来的。以上部分情况，北京卫戍区上报了。）《快报》第3424号（1967年7月27日）报道：北航“红旗”公布了彭德怀的认罪书。（按：北航小报刊登了“认罪书”全文。彭在“认罪书”中，说了1959年7月14日写信问题，表示认罪。）

此后，几个大单位的造反派召开几千人或万人大会面对面对批斗彭德怀。所有的面对面的批斗，都是上面批准的。

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按：发表时删去了标题和正文中“彭德怀”后面的“同志”二字。）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刊登《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解放军报》8月16日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三篇社论，都说到彭的“黑后台”是“中国赫鲁晓夫”即刘少奇。

1970年9月17日，彭德怀专案审查小组遵照黄永胜的“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整理好材料报上。这个报告提出：“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11月3日，经黄永胜同意，这个报告报给彭德怀专案组组长周恩来。周恩来作了大意如下的批示：呈主席阅批。毛泽东作了大意如下的批示：政治局各同志阅。政治局“各同志”都圈阅了。报告存档。

1974年11月29日，彭被迫害含冤逝世。终年76岁。临终前，他嘱咐侄女梅魁：“把我埋到老家去，上头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和乡亲……”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为彭德怀平反的决定。12月24日，首都隆重举行彭德怀追悼会。

彭大将军是我一生最为崇敬的人。

#### 十五、“早请示、晚汇报”的由来

1967年11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给毛泽东送上《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左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在较短的时间内，掀起了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高潮。工人们说：

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心明眼亮有方向；  
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检查工作和思想。  
生产中看看车头镜（语录牌），干劲猛增长；  
交班交语录，互相关心互相帮。”

与这个报告同时送给毛泽东的，还有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1967年11月11日给毛泽东的报喜信（报北京针织总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之喜）。11月15日，毛泽东对这两个报告作了批示：“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两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

1967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以一、二版近两版的篇幅发表“首都新闻单位驻北京针织总厂联合记者组”写的《支左工作的一面红旗——记8341部队驻北京针织总厂支左人员贯彻执行支左工作三项原则的经验》。这篇报道说：“职工们上班前站在毛主席像前，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有关语录，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

此后，全国绝大多数单位（机关、军队、工厂、学校、商店、生产队、团体等）实行“早请示、晚汇报”。

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下达印明“毛主席批示：照办”的文件《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这个文件中说：“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的活动。”本来大家就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个文件下达后，普遍地迅速地不再“早请示、晚汇报”，绝少例外。

#### 十六、陈伯达的一封信

1971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电子工业部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批判陈伯达的文章《“电子中心论”批判》。陈伯达鼓吹过“电子中心论”没有？确实鼓吹过，在一些场合讲过。他的主张，集中表现在一封信里。此信全文如下：

主席、林副主席、总理、康生、江青、姚文元、杨成武、吴法宪、叶群、汪东兴：

在21日晚，我同文元同志到广播局，军管小组的同志说，因我们广播电台的技术差，功率小，沿海和边疆一带用的收音机，一开就是听到敌人的和台湾、美国、苏修等广播的声音，听不到我们中央台的声音。我和文元同志都觉得必须很好地抓一下关于电台器材生产的工作。同时我觉得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大力发展电子工业，大力发展现代化的电子技术。电子器材的工业，发展现代化的电子工业设备，不仅是电台设备的需要，而且是一切工业、交通部门的

需要。大量的事实说明，现代化电子工业的发展，将促进我们的工业大跃进，将是在我国进行人类历史上新的工业革命的出发点。采用现代化电子技术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产品质量，而且能够大大节约原材料，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增产节约的要求，同时是实现主席历来提出的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一项具体措施。对国防工业来说，无论海、陆、空军都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化的电子装备。国防工业，在这方面可能而且必须作为先导，对整个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带头作用。现代化的电子技术，在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发展，时间不算长，发展程度也很不一样。但一般说来，他们都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制度）所局限，生产力和现有生产关系存在着对抗的激烈的冲突。在他们那里，要在各个部门实行电子化的广泛改革，有着自己不能解决的困难。在我国条件下，情况完全不同。我国有突破前人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武装，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他巨大的优越性。关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全国人民群众意气风发，发奋图强，完全有可能后来居上，使电子技术迅速普及，使我国成为第一流电子化、第一个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最强国，把美国、苏联都抛在后头。

这个问题是在1963年根据主席的启发和教导，根据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而提出来的。但是当时被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反对，以致搁下来。经过将近两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各个方面都彻底破产了。我想，按照主席指示办事，再提起这个问题是必要的，请主席考虑。

这个问题是否可由科学部门、国防科委、计划部门和工业部门召集一个专门会议，考虑一个方案，统一部署，做出计划。可由国防科委及国防工业部门，先开会，后提问题和方案。

请主席批示。

并转给聂荣臻、李富春两同志参考。

陈伯达1968年1月29日

陈在1963年就提出过大力发展电子工业的意见，说明他具有远见卓识。（说“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反对”，无疑是污蔑，刘、邓、彭、薄是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在1968年1月“天下大乱”之时又提出，而且郑重地写信向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提出，说明他勇敢和睿智。他提出的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发展战略问题。他的意见，当时没有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不予重视，下面是不好办的。

《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中共中央1971年1月26日发出）说：“他（陈伯达）还提出‘中国工业要以电子为中心’，‘现代化电子工业的发展，将促进我们的工业大跃进，将是在我国进行人类历史上新的工业革命的出发点’，公然同毛主席指示的‘以钢为纲’的方针相对抗，”谁是谁非，不难明白。

今年（1992年）年初，我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江泽民总书记要求加强电子工业。江泽民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我联想到二十几年前陈伯达向中央的建议，不禁感慨系之。

□ 原载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版 有删节，本文未为未删节版。

~~~~~

【人物春秋】

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

• 霞 飞 •

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身心备受折磨，但他没有屈服，而是采取特殊方式进行抗争，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

◇ “靠边站”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以此为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按理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让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稼祥参加。可奇怪的是，王稼祥并没有接到会议通知。会后，他收到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文件，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撤销职务，并受到批判。王稼祥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将要席卷中国大地，灾难难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此时，王稼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的职务还没有被解除，但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不通知他参加，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也没有通知他参加。中联部的部长一职被刘宁一代理后，他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果然，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王稼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被中联部代理部长刘宁一取代。

1966年7月初，李富春、汪东兴来通知王稼祥说：中央决定，凡是不直接参加中央常委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要搬出中南海，马上就得搬。中央办公厅已经为王稼祥准备了三处房子，供他挑选。汪东兴说，我看北海后门那一处房子比较好，离公园近，平时可以去散步。这样，王稼祥告别了住了近十年的中南海，在北海后门的一处住宅里闲居。但是，他的心情不能平静，他担心着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

◇ 康生盯上了他

不久，王稼祥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联部机关里的造反派开始造反。起先，他们集中揪斗的是中联部副部长许立。不久，斗争的矛头就指向了王稼祥。

一天，康生去中联部看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人王力（他有中联部副部长的职务——笔者注）也跟着去了。康生看了一通大字报后，发现大多数是给许立贴的，没有给王稼祥贴的，于是，他和王力临时决定召开部机关干部大会。会上，康生一开始就批评中联部，说：中联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不对头，“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进中联部的门”。他煞有介事地指着中联部的大字报说：你们看一看，你们都贴了一些什么大字报，根本没有抓住大方向。你们为什么不集中火力批“三和一少”（王稼祥于1962年初曾建议应改变外援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后被批为所谓“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编者注）？这才是大方向。王稼祥是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过去他领导下的中联部，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中联部搞“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应该是批王稼祥，他是提出“三和一少”的代表人物，应该把他批倒斗臭。

在康生的煽动下，一时间，在中联部机关，给王稼祥贴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会议厅里，楼道里，都贴满了。造反派们没有忘记住在北海后门的王稼祥，他们闯进王稼祥的家，强行把王稼祥架到中联部，名曰让他看大字报，实际上是抓去批斗。造反派每次把王稼祥架到中联部，都对他进行围攻，开批斗会。批斗会上，给王稼祥挂上黑牌子，让他坐“喷气式”，使王稼祥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大折磨。本来身体就不好的王稼祥支持不下去了，他不得已提起笔来，给汪东兴写了一封求助信。他写道：我本来应该主动到中联部去看大字报，接受群众的批评，认识自己的错误，改进工作，但我身体不好，最近总是发高烧，心跳每分钟100次以上，所以，我

请求迟一些去中联部看大字报。汪东兴接到王稼祥的信后，了解了王稼祥的处境，便在信上批示同意王稼祥的要求。有了汪东兴的批示，王稼祥的生活获得了暂时的平静。

汪东兴还把王稼祥受到冲击的事情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很关心王稼祥。一次，中央召开一个小型会议，有伍修权参加。会议休息时，周恩来特意把伍修权叫到自己身边，对他说：“毛主席有过指示，王稼祥同志是有过功劳的人，现在身体不好，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处。”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修权同志，你是了解王稼祥同志的，也了解中央对他的态度，你应该出来替王稼祥讲讲话。”会后，伍修权马上到中联部，召开17级以上干部大会，向大家介绍了王稼祥的经历和对党的事业的重大贡献，特别提到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的功劳。伍修权还说：王稼祥同志在许多问题上都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毛主席多次表扬过他。伍修权针对造反派对王稼祥的批判说：不能搞过火斗争，你们批评他的错误是可以的，但是要文明一点，要讲政策，要照顾他的身体，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你们如果把他斗死了，并不能说明你们斗争水平高。他还针对造反派头头说：你们也不要太骄傲了，要听听别人的意见。我们是干过几十年革命的人，什么艰难斗争都经过，起码可以给你们提一点意见。

中联部的造反派把伍修权的讲话报告给了康生，康生非常恼怒，他对造反派头头们说：伍修权保王稼祥，那就斗伍修权，伍修权早就是王稼祥的黑干将了。康生此言一出，中联部的造反派们立即开始斗争伍修权。在中联部，攻击伍修权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伍修权也成了斗争对象，再也不好说话了。

◇ 从“保护对象”到“斗争对象”

虽然，康生继续鼓动中联部的造反派进攻王稼祥，但由于有汪东兴的批示，造反派们还是没敢轻举妄动。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提到王稼祥，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了我。毛泽东讲话后不久，周恩来提出一个意见，大意是：王稼祥过去有功劳，是保护对象，不能对他搞批斗；如果要斗，也只能文斗，不能武斗；批斗王稼祥，只能在中联部机关内，别的单位要批斗王稼祥，必须经过周恩来同意才行。中央警卫局还指示负责警卫王稼祥住宅的战士：不准任何人进入王稼祥住宅揪斗他，不得把王稼祥揪到社会上去批斗。

周恩来等对王稼祥采取的保护措施，一开始还是很有效的，无论是中联部的造反派，还是社会上的红卫兵，在一段时间里，都不敢闯进王稼祥住宅去胡闹。但造反派、红卫兵们也有他们的“智慧”：不是不让揪斗王稼祥吗？那么，给王稼祥贴大字报总可以吧！王稼祥不是因病不能去中联部看大字报吗？那么，把大字报给他贴到家里去让他看总可以吧！于是，他们就以给王稼祥贴大字报为名，到王稼祥的住宅里去，把一捆一捆的大字报送到王稼祥的家里，“勒令”王稼祥把大字报贴出来，还逼迫王稼祥的身边工作人员把会客厅腾出来专门贴大字报；在会客厅里，拴上一条条绳子，把大字报拉在绳子上，四面墙上也贴满了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极尽攻击、污蔑之能事，给王稼祥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罪魁祸首”、“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大帽子”。此外，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要把王稼祥“斗倒斗臭斗垮”。王稼祥看了这些大字报，非常生气，他对妻子朱仲丽说：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我是修正主义，他们连什么是修正主义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名词最早来源于德国的伯恩斯坦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后来，列宁在《怎么办？》等书中，针对俄国的伯恩斯坦派经济主义的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如果不是反对、攻击或篡改马克思主义，怎么能算做修正主义？王稼祥还说：至于说我们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真是无法理解。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常委集体领导的，怎么会分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呢？1967年1月，姚文元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发表后，王稼祥看了，非常气愤地把文章一摔说：这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17年来，中央自己掌握的宣传机构，成了反中

央的集团，真是历史上少有的奇谈怪论！

由于有周恩来等人对王稼祥的保护，一心要打倒王稼祥的康生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67年2月，中央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一大批老干部被牵连进去，全国也掀起了“反右倾”、“反复辟”的浪潮。康生趁机专门跑到中联部，找造反派头头谈话说：叫“三和一少”不够了，应该叫“三降一灭”（即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笔者注）。中联部就是“三降一灭”的“制造工厂”，要砸烂这个“制造工厂”。在这个“制造工厂”里，伍修权是头头，后台是王稼祥。听了康生的这番谈话，中联部的造反派立即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伍修权。伍修权为了正确引导运动，于1967年4月6日写了一张大字报，阐述了自己对中联部所发生的严重问题的看法。伍修权的大字报一贴出，许多群众感到，不能否定过去中联部的工作，更不能搞无限上纲。他们认为，中联部过去在王稼祥等人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工作，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不买康生的账了。康生急了，于4月8日亲自跑到中联部，找中联部造反派头子，做出部署，要打倒“反革命分子”伍修权。他说：伍修权是自己跳出来的敌人，是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倒。第二天，按康生的部署，中联部的造反派开始批斗伍修权，给伍修权挂上了“黑帮分子”的牌子，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连续批斗。由于中联部许多群众不信康生那一套，因此，批斗伍修权并不积极，有的群众组织还反对这种做法，这样，在中联部就分成了两派。在此情况下，康生又鼓动部分高校学生跑到中联部去造反。在康生的策划下，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人大三红”造反组织成立了“专揪伍修权兵团”。他们进驻中联部后，又是开批斗伍修权的会，又是贴大字报，把中联部的正常工作秩序搞得乱七八糟。

接着，在康生的授意下，“人大三红”的红卫兵开始闯王稼祥的住宅了。“人大三红”的红卫兵一开始是打着调查伍修权的“问题”的旗号，让王稼祥写关于伍修权的材料。王稼祥在材料中，很客观地评价了伍修权的工作，基本调子是肯定的。“人大三红”的红卫兵当然不满意，就让王稼祥反复地“重新写”。但王稼祥不管怎么写，都是原来的调子。于是，“人大三红”的红卫兵转了方向，又让王稼祥写关于刘少奇、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材料。王稼祥在写这方面材料时，还是很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刘、邓两人的工作，没有写否定性的文字。于是，“人大三红”的红卫兵又让王稼祥写关于“三和一少”的材料，逼近王稼祥“自身的问题”。还让王稼祥写完这方面材料后，抄一份给汪东兴。王稼祥在写材料的过程中，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比较客观地写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这一方针的根据，没有给自己“上纲上线”。之后，王稼祥并没有将材料交给“人大三红”红卫兵组织，而是通过中办交给了汪东兴。很快，他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让他不要将这方面的材料交给“人大三红”。可能是由于汪东兴打了招呼，“人大三红”也没有派人来要这个材料。不久，中联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一批人，也来到王稼祥的家里，要王稼祥交代他对东南亚武装斗争所出的“坏点子”、他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关系，让他写成交代材料，他们一个星期后来拿。

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把王稼祥搞得身心疲惫。1968年，他在《我的履历》中写道：“在这个期间，又是谈话，又是写材料，我又紧张起来了，心跳又加快了。我虽然每晚服用大量安眠药，但睡眠仍不安，于是我处于疲倦、不安、紧张、恐惧的情况下过日子。”中联部造反派逼迫写交代材料后，“我就更紧张了。我赶写材料，这样就更疲倦了，再加之，这时候街上出现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的标语，于是我就更加恐惧了”。

在康生的操纵下，王稼祥很快由“保护对象”变成了“斗争对象”。1967年6月2日，中联部的造反派冲到王稼祥家里，一进院子就高喊口号：“打倒王稼祥！”“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揪出来！”他们把王稼祥和朱仲丽分别关在两个屋子里，分别进行“斗争”。他们要王稼祥交代与刘、邓的“黑关系”，与彭真、杨尚昆“勾结的内幕”。王稼祥实事求是地讲了他与刘少奇、邓小平的正常工作关系，与彭真、杨尚昆的正当工作联系。造反派说他不老实，又是喊口号，又是动手压他的头，让他“低头认罪，老实交代”。造反派还让他交出上星期让他写的

交代材料，王稼祥说，已经送到汪东兴处去了，造反派们大怒，要王稼祥交出底稿。在造反派们的一再逼迫下，王稼祥打开保险柜取底稿，造反派们一拥而上，把王稼祥保险柜里的许多重要材料一并拿走。临走时，他们还勒令王稼祥继续写交代材料，过几天要到中联部去，一件事一件事地交代，要你交代多少次就要交代多少次。

造反派们频繁的逼迫和批斗，使王稼祥极度紧张，精神紊乱。造反派刚刚离开，他就高喊：“我没有罪！”当晚，他服下安眠药，但还是不能入睡，仍然大声喊叫。无奈，只好增加安眠药的剂量。不料，当夜，王稼祥脸色苍白，朱仲丽忙将他送到北京医院急诊室抢救。周恩来派中办的杨德中来看望他，指示医生全力抢救。经医生全力抢救，直到第三天，王稼祥才醒过来。他在医院里住了10天，又回到家里，接受批斗。

◇ 让他心碎的后代问题

王稼祥有一个儿子名叫王命先，出生在安徽泾县老家，原来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空军报社工作。1952年至195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学校计划统计系担任资料员。他工作认真，性格内向，平时沉默寡言，很少与人来往。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大三红”的造反派认定他是“牛鬼蛇神”，铺天盖地地给他贴大字报，揭发、批判他的“罪行”，还在全系开批判大会，给他挂上了黑牌子，坐“喷气式”，勒令他当场交代自己的“罪行”。王命先回到家里，怎么也想不通，便离家出走，跳河自杀了。第二天，他的尸体被发现，公安部门认定为自杀。得知自己儿子死亡，王稼祥心痛欲裂，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

王稼祥还有两个孙子、一个养女。“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学里“停课闹革命”，他们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每天出去到社会上参加揪斗“走资派”，揪斗“牛鬼蛇神”；回到家里也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他们要和王稼祥“划清界限”，对王稼祥和朱仲丽不理不睬，这使王稼祥非常痛心。

◇ 被迫检讨

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检讨，最集中的体现在1968年2月中联部机关召开的群众会上。王稼祥写检讨，有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不乱说，更不给别人扣帽子；二是多讲自己的过，少讲自己的功，但是也绝不把不属于自己的过，说成是过。这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格。王稼祥在那次检讨中说：

我过去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的重要成员之一，我这个毫无工作经验没有参加过下层实际工作、而只读了一些书本的人，被指派为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四中全会不久以后，我与任弼时同志一同进入中央苏区，犯了许多错误。在政治工作方面实行错误的“一长制”，取消党委制，把红军的任务错误地缩小为打仗；在土改方面，执行了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在肃反方面……也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逼、供、信”的错误。

我们进入苏区，正当第二次“围剿”反攻胜利以后、第三次“围剿”的前夜，当时项英同志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英明的战略战术军事思想，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各个击破”。项英同志认为这是守株待兔，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我当时支持了毛泽东同志，这并不因为我当时就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而是简单地认为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又感到项英同志同我一样，没有听过枪炮声，能正确处理战略战术问题吗？所以我就支持了有战争经验的毛泽东同志，结果三次“围剿”，敌人的“并进长追”失败了，我们大大胜利了。胜利后，上海中央来电，要打大城市，把江西几个苏区连成一片，我积极地赞成这一错误决定。当时包围赣州一个长时期，结果我们失败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原来就反对打赣州的主张的正确。

中央在宁都开会，发生了毛泽东同志是留在前线指挥工作还是去后方的问题，我是主张毛泽东同志留在前线工作的，但是处于少数。不久以后，敌人开始四次“围剿”，我还是在前线。在四次“围剿”中，我受了重伤，离开前线回到瑞金。不久后，五次“围剿”开始了，敌人实行堡垒政策，步步为营，发生了外线作战内线作战的争论，我又错误地支持了内线抵抗策略。五次反“围剿”不久，我伤口大化脓，入医院重新开刀，完全离开一切工作。直到长征开始，才把我从医院里抬出来，一路上伤口还流脓。在遵义会议的时候，我支持了毛泽东同志。可是红军到陕北后，过黄河东征时，我又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总之，在内战时期虽有曲折，但总起来我应该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

在西安事变后，利用了当时的条件，出国开刀治伤口，1938年回延安。在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国际指示，没有歪曲这些指示。在全会上拥护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反对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路线，被任命做军委和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这段时间，基本上执行了主席的指示。

延安整风前，就得了带伤性的肠胃病，入医院治疗，可惜未参加整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我写了一个短的检讨信给中央，1946年又出国治病（肠胃病和X光烧伤）。1947年回东北参加工作。1949年初参加了七届二中全会，对过去的错误作了口头检讨，当时中央批准了这个检讨。

对于60年代初他提出的所谓“三和一少”问题，王稼祥在1969年1月25日的检讨书中是这样写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出赫鲁晓夫是共产主义的叛徒这个有名的论断。我当时在内心里是不同意这样的论断的……虽然我不否认赫鲁晓夫可以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因为要承认当时赫鲁晓夫已经是共产主义的叛徒，便立即发生同赫鲁晓夫决裂的问题，因为同叛徒不能有任何合作的余地的……我便挺身而出为维护中苏关系，来避免中苏破裂或者至少来推迟中苏的破裂。我说什么赫鲁晓夫可以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这实际上是与林副主席唱对台戏！

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在另外的材料中已经说明：双方都拥有核武器来进行的战争是两败俱伤的战争，是没有胜利者的战争，是带毁灭性的战争，这种战争是不能够打的，只能避免……而林副主席就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即使有了原子弹后，最后决定胜负的还是地面上的近战，所以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唱了对台戏！

我当时又鼓吹对美帝也应采取较为缓和态度，对印度反动派也主张缓和一些……当时我完全没有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而是相反的，完全违反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而和林副主席在当时的几个著名论点简直唱了对台戏！

我于是想想越觉得问题严重，于是乎，我就挺身而出，来向中央勇敢地提意见，于是乎就形成了我的“三和一少”的外交路线，于是乎我就出来纠正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和林副主席的著名论点，这是何等的狂妄呵！这的确是狂妄之极了！这简直是发疯了！而这是事实啊！

从上述王稼祥的检讨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是客观的，从不隐瞒什么，也不歪曲什么，虽然当时他写检讨不能不带有当时的政治烙印，但他没有把“问题”推给别人，对自己也没有说过头话。

◇ “解放”变“下放”

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说过王稼祥的好话，加上王稼祥也写了“检讨”，于是不久，他被“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王稼祥，同时就被“下放”了。

1969年10月的一天，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来到王稼祥的住处宣布说：从今天起，王稼祥同志解放了，解除隔离。接着，他又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们三天之内动身去河南的信阳地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路上有人护送，那边的食宿已经安排好了。

到了信阳，王稼祥等被安排住在信阳军分区干休所的一幢平房里。这座平房四周砌了两米高的围墙，信阳军分区调一个警卫班负责警卫。

王稼祥住在这里，还是很放松的，他每天除了读书，就出门散步。这里由信阳军分区分管，军分区的领导在生活上对王稼祥很照顾，但令人奇怪的是，上边还派了一个姓马的管理员陪着王稼祥，王稼祥的一切行动，都要由马管理员同意。而马管理员对王稼祥的行动是有限制的，王稼祥散步，只能在住处附近，不能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王稼祥也不能随便去商店。

王稼祥在信阳接触到的不多的人当中，有两个人对王稼祥更关心一些。

一个是炊事员史遂良。他对王稼祥照顾得十分精心。他知道王稼祥胃口不好，做饭时，就把饭煮得不硬不烂，很合王稼祥的胃口。王稼祥与史师傅相处得非常好。

另一个人是女医生王斌。按规定，王医生每个星期要来给王稼祥检查一次身体。每次检查身体，王医生都非常认真，对王稼祥也十分敬重。每当她在外边听到一些中央的消息，就背着马管理员，悄悄地告诉王稼祥。1970年庐山会议后，王斌听到北京一些消息，就告诉王稼祥说：毛主席已经识破了那几个人的野心。四届人大要开了，你是人大代表，四届人大召开，你就解放了。在1970年10月初，王稼祥咳嗽得厉害，还发起烧来，王斌诊断为急性中毒性肺炎。当地医疗条件有限，一时没有好的治疗办法，她很着急。这时，朱仲丽建议她给上级写信反映这一情况。王斌接受了这一建议，给信阳军分区写了一份关于王稼祥病危的报告。报告中说，王稼祥需要回北京治疗，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要求信阳军分区发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希望能够同意将病人送到北京医院去治疗。信阳军分区见到这份报告，没有怠慢，很快就给中央发去了电报。中央很快回电，同意信阳军分区派人护送王稼祥到北京医院治疗。王稼祥于1970年10月回到了北京。

◇ 毛泽东说了公道话

王稼祥住进北京医院后，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病情很快好转。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在揭批林彪的会议上，聂荣臻、周恩来先后提到了王稼祥，肯定王稼祥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大贡献。这对王稼祥来说，是十分有力的帮助。

1972年6月，王稼祥夫妇与王震夫妇一起看望朱老总。朱德见到王稼祥后，十分高兴。他对王稼祥说：毛主席没有忘记你，我们都认为你是有功劳的，是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的，你会很快分配工作的。朱老总实际上是婉转地向王稼祥传达毛泽东重新起用王稼祥的意思。王稼祥心中有数，回去后就动笔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自我批评外，还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信写好后，王稼祥通过王震把信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信后，向周恩来等人讲了一大段对王稼祥高度评价的话，他说：

“王稼祥同志写了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

毛泽东还批示，让王稼祥参加老中委学习班，请周恩来办。毛泽东还让周恩来在扩大的九届三中全会上传达他的话。这对于王稼祥进入十届中央委员会，起了关键作用。

1973年8月，中央召开十大，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还为他配了三个秘书。十大之后，中央分配王稼祥做十大文件的俄文翻译工作。这项工作做完后，中央又安排他进入新成立的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班子，协助周恩来搞外事工作。

◇ 在忧郁中去世

但是，十大之后，“四人帮”活动猖狂起来，他们借“批林批孔”，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月22日发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孔老二的亡灵和新沙皇的迷梦——评苏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一文中，重提“‘三和一少’妖风”。虽然指的是刘少奇，但牵涉到王稼祥。王稼祥还从一些老同志那里得知，“四人帮”到处伸手，到处“点火”，把斗争矛头又指向了老同志。对此，王稼祥十分忧虑。

1月24日，王稼祥得到通知，要他于1月25日去体育馆参加万人“批林批孔”大会。王稼祥心情很沉重，对朱仲丽说：他们搞这样大声势的“批林批孔”大会，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当天晚上，他带着忧郁的心情睡下。第二天凌晨，他心脏病突然发作，经急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68岁。

王稼祥逝世后，中共中央于1月30日召开了追悼大会，党中央、毛泽东送了花圈。

王稼祥没有看到“四人帮”垮台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原则，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了特殊的抗争。

□ 《党史纵览》 2006年第8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